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与党内和谐

张红安

(淮阴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淮安 223001)

摘要: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参与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周恩来始终勇于开展自我批评, 是弘扬共产党人自我批判精神的典范。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 为促进全党的思想统一、营造党内的民主环境、增强党内的团结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为我们增进党内和谐提供了重要启迪。

关键词: 周恩来; 自我批评; 党内和谐

中图分类号: B0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774(2009)06-0057-03

增进党内和谐, 是我们党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明确要求。周恩来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党内和谐, 但其许多思想和实践都是与增进党内和谐密切相关的。本文仅从周恩来自我批评精神这一视角, 探讨周恩来对增进党内和谐贡献。

一、周恩来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 而周恩来是我们党勇于开展自我批评的典范。综合起来看,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可分为三类:

第一, 总结经验式的自我批评。革命战争时期, 我们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周恩来作为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 从不掩饰由于自己而造成的失误, 而是勇于自我批评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南昌起义是党和人民军队历史上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但周恩来从来没有以打响第一枪者自居, 而对于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在潮汕地区的失败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反思。1960年7月, 周恩来曾总结道: “南昌起义本身是正确的, 但在领导思想上有错误: 单纯军事行动, 中心是城市的观点, 没有跟当地农民结合起来建立根据地的思想。”^{[1]306} 1972年6月, 周恩来再次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 “它用国民革命左派政府名义, 南下广东, 想依赖外援, 攻打大城市, 而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发动和武装农民,

实行土地革命, 建立农村根据地, 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2]190}。这里, 周恩来在自我批评中, 深刻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类似的自我批评, 在因革命战略重心问题与毛泽东出现意见分歧时, 也发生过。当周恩来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后, 不仅进行自我批评, 还及时采取挽救措施。他要陈毅“告诉泽东同志继续任职”, 并向全军宣传毛泽东的革命战略重心思想。在“九月来信”中, 周恩来明确指出: “先有农村红军, 后有城市政权, 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 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3]32}。从一定意义上说,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推动了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

第二, 承担责任式的自我批评。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转折点, 是以结束错误路线为前提的。在重要历史关头, 周恩来通过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 使中国革命重新拨正航向。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失利, 党和红军迫切需要改变领导机构。但博古为自己辩解, 李德拒绝正视问题, 只有周恩来把失败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承认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犯有错误, 特别是同意过以堡垒对堡垒的作战计划, 应该“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4]157-158}, 并主动请求撤销自己红军总政委职务, 撤销军事指挥权和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 力荐“毛泽东同志是军事方面领

收稿日期: 2009-10-09

作者简介: 张红安, 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导我们最合格的领导人。”^{[4]159}正是周恩来勇于自我批评、政治上鼎力支持，一直遭受“左”倾主义者打压的毛泽东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军事三人小组，开始在实际工作中领导党和红军。聂荣臻曾回忆说：“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5]240}

第三，忍辱负重式的自我批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事业的过程中，不仅要经历严峻的对敌斗争，也要经历党内矛盾与分歧，甚至党内危机。在重要关头，周恩来总是抛却个人荣辱，以自我批评来化解党内的矛盾与分歧，统一全党的思想。

1930年3至9月间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周恩来和瞿秋白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结束了李立三的错误领导。但随着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错误性质升级为政治路线错误，原来得到共产国际认同的六届三中全会被指责为“调和主义”，周恩来被指责为妥协分子。王明等人借机发难，而受过批评的罗章龙、何孟雄等人，也打着反“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旗帜，要求改组中央。面对党内危机，周恩来希望通过自我批评、退出领导层而尽快平息。在米夫把持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印发了在三中全会上传达的共产国际决议报告，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2]284}会上，周恩来还与瞿秋白表示愿意退出中央政治局。

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在经济建设问题出现了“冒进”与“反冒进”之争，但毛泽东将之上升为政治问题。在“反冒进是反马克思主义的”^{[6]268}的严厉指责下，一批同志深受压力，周恩来选择自我批评以解放其他同志；“文革”期间，“二月抗争”事件后，周恩来选择自我批评以保护老同志；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组织批判极“左”思潮，但因事关“文革”评价问题，与毛泽东再次出现分歧，周恩来再次选择自我批评以维护党内团结。

二、周恩来自我批评的立足点：维护党的整体利益

从上述三类自我批评可以看出，确需担责的是第一类，其余主动揽责。但无论哪类自我批评，其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党的整体利益。

周恩来始终站在党的立场开展自我批评。周恩来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革命遭遇严重挫折、党面临分裂危险、自身确有错误。对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周恩来解释为“相忍为党”^{[5]131}。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六届三中全会

还有‘左’的东西……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3]309}。在遵义会议上，正是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和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党和红军才有了新的坚强统一的领导集体。1958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中的高指标进行了调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承认大跃进有过激之处。有人认为，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本可以结成一支强大的联盟，反对毛泽东和他的错误做法”，但周恩来却谦虚地表示“在如何管理经济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许多东西要学”^{[4]361}。韩素音将此解读为，“这不仅仅关系到对‘大跃进’或者对毛的民粹主义观点的批评正确与否，而且，在中国面临美苏两大敌人的时刻，这还关系着党是否会分裂”^{[4]364}，可见，党的立场是周恩来衡量判断是非和坚持自我批评的根本立场。

周恩来始终把自我批评视为党内的正常生活。延安整风期间，围绕“六大”出现了很多争论，作为“六大”主要负责人的周恩来受到了指责。但周恩来却认为，“这是启发思想的一种争论。党内思想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解放”^{[3]157}。1949年4月，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虽然有二十七八年的党龄了，还不是犯过许多错误，每次谈起来，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很好，不能满意”，因此，“我们入党入团以后，要很好地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样才能很好地前进。这是对党员团员起码的要求”^{[3]327}。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进一步认识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是党内正常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高岗事件发生后，周恩来说过，“党内民主及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发展，党内任何干部必须无例外地受到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1]119}。1972年6月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明确提出：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不要看一个领导同志，尤其我今天在政治局工作，负领导的一部分责任，就不能批评，就不能监督，不能提意见，没有这回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正常生活”^{[7]243}。

周恩来为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开展自我批评。周恩来曾说，“如果我写书，就写我一生的错误，这不是卢梭的《忏悔录》，而是让活着的人都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8]。周恩来把错误放在党的历史大背景下思考，坚持在自我批评的同时，寻找犯错误的原因和改正错误的办法。1943年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被批判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周恩来认真学习党的整风文献，阅读历史资料，用历史的眼光系统回顾党的历史，严肃检查自己在历史上几个关键时期的错误，写下了4篇数万字的学习笔记和检查笔

记，并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五次发言。1951年9月在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周恩来向知识分子敞开心扉：“一个人之所以犯错误，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所以需要向进步的理论求教；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所以必须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1]360}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又以高、饶事件为例，对犯错误的同志如何检讨错误、改正错误全面阐述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其次，应该求教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从检查自己的党性来认识自己的错误；第三，应该努力反省……一定要用党的尺度来衡量……第四，应该靠同志们的帮助”^{[1]125-127}。为了帮助党内外干部群众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周恩来还毫无保留地剖析了自己。周恩来的自我批评顺应了历史和时代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从新的角度进一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从更高的立足点，更大的全局考虑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9]261}的需要。

三、周恩来的自我批评对增进党内和谐的意义

从维护党的整体利益出发，周恩来的自我批评自然而真实、坦荡而真诚，体现了共产党人的鲜明党性，对增进党内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促进了全党思想的统一。思想统一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走到一起，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提供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而在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党内出现矛盾分歧在所难免。解决这些矛盾分歧的最好办法或途径，是在党内开展批判与自我批判。遵义会议上，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使与会的“每个人都受到感动……每个人心头都点燃了巨大的希望之火”，“他所表现出来的完全放弃权力，没有个人的恩怨和野心以及不为自己开脱过失，使出席会议的人心胸开阔，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不再互相挑剔和指责，每个人都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以及献身的意义。”^{[4]159}

二是营造了党内民主环境。党内民主是党内和谐的应有之义。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内民主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尊重党员主体地位，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推进党务公开，营造党内民主讨论环境。”这一重要论述，是对我们党80多年民

主历程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总结。周恩来作为党的六大后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作为遵义会议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始终坚持民主的作风，这种作风尤其表现在自我批评上。

三是增进了党内团结。8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发展壮大，领导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了党内的团结。周恩来深知党内团结的重要性，并十分重视通过开展自我批评来增进党内团结，他多次提出，“高级领导同志中间加强集体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保证我们党的团结”^{[1]121}，“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党的团结”^{[1]349}。在筹划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对创作人员指出，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执行铁的纪律的党，要有坚持革命、团结对敌的精神”^{[10]1782}。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三个观点，即自我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党的团结，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团结的重要保证，个人为了党内团结大局可以暂时忍受一些委屈。自我批评是周恩来团结精神的重要体现，而他在关键时刻的一些自我批评，起到了维护党内团结的关键作用。

尼克松曾说过：“我们在同中国人相处中发现，他们很自信。所以他们能内省其行而不为他们的缺点而惶惶不安”^{[11]333}。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正是共产党人深刻内省力的体现。周恩来的自我批评精神，对于今天增进党内和谐，仍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张明之）

参考文献：

- [1]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金冲及.周恩来传：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3]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4]韩素音.周恩来和他的世纪[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 [5]聂荣臻回忆录[M].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
- [6]刘济生.解读周恩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7]周恩来自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
- [8]刘明钢.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周恩来面对延安整风中的过火批判[J].党史纵横，2002(8).
- [9]冯建辉.从陈独秀到毛泽东——中共六任领袖新视角[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0]金冲及.周恩来传：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1]尼克松.领导者[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